

唐初两蕃与唐的东北策略

李蓉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基础部,重庆400016)

摘要:唐初的辽西走廊,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旦控制这一地区,既可以东扼高丽,西控突厥,更可以此为跳板将势力向广大的东北地区延伸,而当时占据辽西走廊的主要是号为“两蕃”的契丹和奚族,所以唐初的东北策略基本是回护两蕃,争取它们的归附,进而控制辽西地区,达到牵制突厥和高丽的目的。因此,从高祖到太宗,前后用了近30年的时间,最终完成对辽西地区的争夺,并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构,尤其在太宗时期,更征用两蕃军队,利用其地理优势,协同唐军对其东西二邻——高丽和薛延陀作战。

关键词:辽西;东北;辽东;两蕃

中图分类号:K24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2-0119-08

史学界对唐初民族的研究历来多重在突厥、高丽。不容讳言,它们的确是当时唐王朝的主要对手,但笔者发现在研究唐与突厥或唐与高丽的关系时,对时号为“两蕃”的契丹和奚族的作用则是不容回避的,故成此文,以供指正。

—

自后魏以来,契丹和奚族“异种而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1](卷八十四《北狄传》),故“两国常递为表里,号曰‘两蕃’”[2](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传》)。两蕃本事突厥,隋朝势力鼎盛时也曾归附于中央。隋末,突厥强盛,又转而重新依附于突厥,不断侵扰幽州地界,幸赖幽州总管罗艺素有威名,从而使东北边境暂无大碍。

618年,李渊建唐。在东北边境,虽然由于幽州罗艺归附唐朝,唐对东北地区尚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当时唐王朝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对边境四夷基本无暇顾及。加之罗艺忙于为唐征讨刘黑闼、高开道等人,唐可在东北投入的兵力也十分有限。更为主要的是当时北方的突厥正值强盛时期,“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2](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早在隋王朝时期,始毕可汗嫡子什钵苾就受其父派遣领有突厥东牙之兵,管辖范围包括辽西两蕃以及靺鞨等数十部少数民族居住区域,故唐当时根本无力与其争夺辽西地区,不得不在东北采取防御政策和低调姿态。正因为如此,武德初,契丹曾数次抄掠唐东北边境,唐皆无暇还击。武德元年(618年),唐改隋柳城郡为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和柳城一县^①。武德二年(619年),又置辽州总管府以处理契丹内稽部落事务。据《通典·职官十四》记载:“后周改都督诸军事为总管,则总管为都督之任也”。隋文帝时,设并、益、荆、扬四大总管府,其余总管府置于诸

收稿日期:2001-09-14

作者简介:李蓉(1974—),女,重庆市人,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基础部讲师,历史学硕士。

州。炀帝罢之,而唐高祖又复置之。由此可知,总管府实则都督府,比一般州郡负有的军事职责都更强更大。

唐设立营、辽两个总管府,无疑是要加强在东北的防御力量,进而为以后与突厥争夺这一地区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其效果并不理想,不仅武德二年(619年)契丹仍然入寇营州南面的平州,而且始毕卒后,什钵苾虽以年幼不堪继立,但继位的处罗可汗并未剥夺他对东牙之兵的领导权,相反更立他为泥步设,仍旧统领突厥东部各民族。武德三年(620年)处罗大举攻唐时,奚、霫、契丹、靺鞨等东北少数民族正是在什钵苾的率领下自幽州入,与窦建德会师于晋、绛。处罗死后,继立之颉利可汗又以什钵苾为突利可汗,正式建牙帐于幽州之北,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辽西地区。

但当武德四年(621年)唐一举击溃王世充、窦建德、萧铣等劲敌之后,由唐承隋,大局已定,局势逐渐明朗。突利在东偏,管奚、霫等数十部,“征税无度,诸部多怨之”[2](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虽然唐军主力尚转战于中原各地,根本无力经略东北,然而武德四年(621年)契丹别部酋帅孙敖曹与靺鞨酋长突地稽却仍遣使内附。唐高祖将契丹敖曹一部安置于营州城傍,授敖曹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据记载,粟末靺鞨突地稽一部,其实早在隋炀帝时就已来附,当时就被安置于营州[2](卷一百一十《李谨行传》)。这部内附于唐后,唐高祖又以其部为燕州,授突地稽总管一职,仿佛是将该部从营州移居燕州,实则不然。“燕州,隋辽西郡,寄治于营州。武德元年,改为燕州总管府,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其年,废泸河县。六年,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内。……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辽西,州所治县”[2](卷三十九《地理二》)。可见,燕州在隋时称辽西郡,寄治于营州,故《旧唐书·李谨行传》又有突地稽率部居于营州的说法,而实际上从隋炀帝至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契丹孙敖曹部被安置于营州时,靺鞨突地稽部一直都居于营州城西南方的辽西郡^②。但是,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刘黑闳起兵于河北之时,“突地稽身到定州,上书秦王,请节度。以战功封耆国公,徙部居昌平”[2](卷一百一十《李谨行传》)。昌平在幽州境内,距离营州地界已十分遥远,故燕州才在“六年,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内”。久居辽西燕州的靺鞨突地稽部此时举部徙居于昌平,恐怕正与契丹在营、辽一带势力的扩张有关。

契丹别部的归附并不代表当时两蕃已有背突厥而附唐室之心,相反由于武德四年(621年)刘黑闳、高开道数度掩袭幽、易、恒、定等州,加上突厥一再侵扰河北和灵、原、并、汾、潞等州,使得唐河北、河东战事频仍。五年(622年),唐高祖不得不命幽州总管罗艺将所部兵数万人,与秦王李世民共同讨伐刘黑闳,三月平之。六月,刘氏卷土重来,罗艺又受命领兵击之。同年十月,契丹乘乱再寇平州,仍然未见唐予以追讨的记载。但是,十二月,唐高祖却赐书高丽王高建武,书中写道:“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盛美……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2](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诸书记载,唐高祖李渊是有感于隋末战士多陷于高丽才赐书高丽王的,但我认为不尽然,这封书信实与当时东北局势有关,是高祖处理东北问题的一种策略。此时,唐幽州兵忙于应付河北战事,已无遑外略,而契丹偏又于此时南下侵掠,从而使唐东北防线岌岌可危,高祖这封信一来希望高丽能谨守疆界,不要像契丹一样趁火打劫;二来明确表示唐无意于高丽之国土,而愿与高丽通好的想法。高丽既与唐通好,契丹南侵就不能不有所顾虑了。这一策略的效果是明显的。武德六年(623年),除本已归附的契丹酋帅孙敖曹于六月遣使朝贡外,契丹君长咄罗也遣使贡名马、丰貂,次年二月又遣使朝贡,传递了愿与唐交好的信息。

但是,对于契丹西面受突厥影响较大、受高丽影响和牵制相对较小的奚,唐的这一策略却收效甚微。虽然奚在“武德中,遣使朝贡”[2](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传》),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又“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隶营州都督”[2](卷三十九《地理二》)。然而,有学者认为饶乐郡都督府当设于武德五年以前,隶营州总管府。在设置后不久,因突厥侵据,奚众叛附突厥,该都督府曾一度撤废[3]。不管奚于何时叛附突厥,至少在武德六年(623年)奚对唐的态度并不友善。五月“癸卯,高开道引奚骑寇幽州,长史王洗击破之”。八月,“高开道引奚侵幽州,州兵击却之”[4](卷一百九十,武德六年)。

到武德七年(624年),形势对唐越来越有利。首先,除朔方梁师都尚苟延残喘外,唐王朝已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正逐渐显示出中央王朝应有的威势和勃勃生气。其次,同年“二月,高句丽遣使内附,受正朔,

请班王历,许之”[5](卷九百七十七《外臣部·降附》)。同时,唐又遣使册封高丽王高建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如此则辽东三国都成了唐的属国。唐于辽东三国采取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表面上是一视同仁,公允之至,实则表明唐在三国中既不特别支持也不特别反对某一方。这势必加剧三国之间的争斗,三国陷入半岛内部势力范围的争夺中,既牵制高丽对辽西的觊觎,更使其不能与突厥互为呼应结盟,对于唐经营辽西营、辽地区是有好处的。反观此时的突厥,内部颉利、突利二可汗互相猜贰,其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4](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44条)。面对此时唐和突厥的强弱走势,依附于突厥的两蕃不能不产生动摇。“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1](卷八十四《北狄传》),这只是实力较为弱小的民族面对形势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二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唐高祖李渊下诏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面对当时突厥猖狂、国家未安的局势,他在对内“静以抚之”,加紧练兵、修边的同时,还注意对东北突利的争取,与之结为兄弟。突利既与唐亲善,那么受他统领的奚、霫等辽西诸族自然也就乐于与唐亲近。加上贞观元年(627年)阴山以北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因不满颉利亲诸胡而远突厥、重敛诸部,又“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饿”[4](卷一百九十一,贞观元年21条),遂相率背叛突厥,并以回纥5000铁骑击败突厥10万骑征讨大军,使突厥威信大为受损。东北的奚、霫等数十部也趁机相继背叛突利,降附唐朝政府。突利不能禁阻,说明此时突厥对辽西地区的控制大不如前。于是,唐抓住时机,同年将安置契丹孙敖曹内稽部落的辽州改名为威州,由隶营州都督府改隶幽州大都督府^⑤,进一步加强了对辽西的控制。

贞观二年(628年),突利因丧失部众,加之征讨薛延陀、回纥等不力,被颉利拘禁十余日,横加鞭撻,遂使两者矛盾公开化。四月,颉利发兵攻打突利,突利遣使向太宗求救。在这种形势下,突利自身尚且不保,自然更无余力控制两蕃。四月丙申,契丹酋长大贺氏摩会帅其部落来降。同年,唐置昌州,领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契丹降唐令颉利大为震惊和不安。史载:“突厥颉利可汗不欲外夷与唐合,乃请以梁师都易契丹。”[6](卷二百一十九《北狄传》)太宗回复颉利说:“契丹、突厥,本是别类,今来降我,何故索之?师都本中国人,据我州城,以为盗窃,突厥无故容纳之,我师往讨,便来救援。计不久自当擒灭,纵其不得,终不以契丹易之。”[2](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传》)这种坚决的态度、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明契丹对唐朝的重要性,太宗和颉利一样是看得很清楚的。契丹、奚等族在唐的东北,突厥的东偏。对唐而言,占据了辽西这块地方,既可以东扼高丽,又可以西控突厥,还可以此为通道将势力向广大的东北地区延伸。当然,在贞观二年的时候,西控突厥乃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所以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言:“唐高祖和唐太宗都采取回护契丹并利用契丹来箝制突厥的政策”[7](4页)。我个人认为张先生所言虽然精辟,但尚不完全准确。首先,这乃是唐一贯的策略,不仅高祖、太宗,而且后来的高宗、武则天、玄宗等人或多或少地沿用了这一策略。其次,虽然唐的确利用契丹箝制突厥,但当契丹势力膨胀的时候,唐反过来又利用突厥牵制契丹。再者,契丹的作用也不仅限于箝制突厥,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辽东高丽也是一种威慑力量,这在后文将有所论及。

贞观三年(629年)正月,契丹摩会来朝,唐赐之鼓纛,待之甚厚。同年,唐又在契丹与室韦交错的地区置师州,兼领契丹和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这样唐就把由营州直接管辖的靺鞨州建到了今天吉林西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一带,此后突厥对辽西的控制更弱。八月,唐开始大举征讨突厥。面对内部的离心和唐强大的兵势,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即帅3000骑来降,12天后即九月戊午,奚酋长与拔野古、仆骨、同罗等族酋长皆帅众来降。十一月,唐再度出兵。在唐的兵威之下,十二月,突利、郁射设相继入朝归降。同月,契丹渠帅再度来朝。突利入朝,表明突厥已完全放弃对东北地区的控制权,但当时的唐王朝却没能完全取代突厥控制住两蕃所在的辽西地区。因为在灭东突厥的过程中,为了拉拢突厥别部共同对付突厥,唐对阴山以北的薛延陀大加扶持,以致它一跃成为漠北的一大势力,“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皆属焉”[4](卷一百九十三,贞观二年14条)。另据《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记

载：“(贞观)二十年八月车驾幸灵州，次浮阳顿。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契丹、奚……等十三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人，……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也。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汉官司，养育奴等。”可见，当突厥衰败后，薛延陀强盛于漠北，并阻挠其他各部归附，所以两蕃虽归降于唐，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是臣属于薛延陀的，或者是摇摆于两者之间，受两者控制的，只不过由于薛延陀对唐基本上采取臣属国的姿态，加之唐国力强盛，太宗号称“天可汗”，所以两蕃中即使是臣属于薛延陀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亲唐的。这也说明了何以非要到唐击灭薛延陀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两蕃才完全归附唐朝的原因。由此可知，在贞观初，唐对辽西的控制是不完全的、有限的。

尽管如此，当贞观四年(630年)唐最终击灭东突厥汗国后，契丹仍充当了唐招慰东北诸族的中间人，“突厥既亡，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4](卷一百九十三，贞观四年21条)，从而为唐经营广大东北地区打开了局面。此后，两蕃更向唐频繁朝贡。比如贞观五年(631年)十一月，“奚、契丹俟斤并来朝”；贞观六年(632年)六月，“契丹渠帅来朝”；闰八月，契丹、奚并遣使朝贡；贞观七年(633年)“正月，契丹、奚渠帅并来朝”[5](卷九百七十《外臣部·朝贡三》)。三年之中，如此频繁地来朝和朝贡，说明两蕃本身也在试图与唐走得更近一些。

从贞观八年(634年)开始，对河西走廊控制权的争夺又成为唐王朝的焦点所在。直到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河西走廊问题才暂时得到解决。此后，吐蕃再未侵扰唐朝边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太宗后来征辽和经营东北、辽西减少了顾虑。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在与吐蕃、吐谷浑争夺河西走廊的同时，唐已经不动声色地逐步增强了对另一条重要通道——辽西走廊的控制力。这具体表现在营州都督府管辖范围的扩大，下辖民族成分的增多，营州府本身地位的提高，营州都督府逐渐成为唐在辽西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最重要的一个管理机构。当时东北诸夷争相遣使朝贡，接受唐的统治，唐趁势在东北建立了不少羁縻州。各羁縻州之间互相统属，交错设置，民族众多，这就使唐需要在东北地区设立一个能直接对各羁縻州实行统一管理的机构，而营州都督府由于其特殊的战略位置，无疑是最为理想的选择。所以，唐早在贞观三年就将师州、崇州划归营州；六年，又督顺州；十年，再加上慎州，这样连同原来就有的营、辽、昌三州，一共督七州，此后督州数还在不断增加[2](卷三十九《地理二》)。其中，师州领契丹和室韦部落；崇州领处奚可汗部落；顺州是突厥败后太宗“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4](卷一百九十三，贞观四年9条)而来。突利为首任顺州都督，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所以安置的当是突厥降户。慎州乃武德初置，领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而辽州所领乃契丹孙敖曹内稽部落。昌州领契丹松漠部落。七州中共计有3州领契丹部落，1州奚族，1州突厥降户，1州靺鞨族，两蕃所占比例为57%。事实上，后来“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6](卷四十三下《地理七》)。其隶属情况如下表。

唐河北道羁縻府州一览表

民族	州	府	隶属
突厥	2	/	营州都督府
奚	9	1	营州都督府
契丹	17	1	营州都督府
靺鞨	3	3	营州都督府
降胡	1	/	幽州都督府
高丽降户	14	9	安东都护府

(资料来源：《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七》，时间截止至696年)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696年以前两蕃的26州2府皆属营州都督府管辖，分别占营府所辖羁縻府州数的40%和83%，比例同样很高。虽然这些州仅是“以州名羁縻，无所役属”[2](卷三十九《地理二》)，

但毕竟是唐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听命于中央,遵守朝廷政令,从而减少了与唐对抗的可能。这样高的比例只能说明唐对两蕃的控制是通过营州都督府来具体实现的,营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统领两蕃、控制辽西,从这个意义上说,营府力量的逐渐增强也就意味着唐对辽西控制力的逐渐增强。同时,从上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696年以前,整个河北道的羁縻府州隶属营州的共计有31州5府,幽州都督府只管降胡州1,安东都护府管高丽降户14州9府,可见营府除主要控制辽西两蕃之外,还是当时唐在东北最为重要的一个管理机构。

三

在太宗统治的中后期,随着营州都督府对辽西控制力的不断增强,唐就开始尝试由营州都督统领两蕃军队协同唐军作战或充当唐军的先头部队,利用两蕃地处辽西的地理优势,分别对其东西二邻施压,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其西面的薛延陀。贞观十三年(639年),突厥40余人欲行刺太宗,事败被斩,这令太宗对将突厥降户安置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决定产生了动摇。于是,七月,下令册封突厥李思摩为可汗,率“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夫世作藩屏,同之带砺,长保边塞”[8](卷六《封怀化郡王李思摩为可汗诏》)。但是,自突厥败亡后,薛延陀已占据其故地,胜兵20万,突厥惮于薛延陀的兵势而不敢出塞。为此,唐不得不称薛延陀为大,突厥为小,碛北、碛南分而治之,并规定若一方越界抄掠,唐必发兵问罪。薛延陀不得已奉诏,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陀尽其甲骑并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众合二十万,卒一人马四匹……以击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种落走朔州,留精骑以战延陀,乘之及塞。诏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等压其东境”[5](卷九百八十五《外臣部·征讨四》),李勣、李大亮、张士贵等人分道击之,薛延陀大败。这是两蕃见于史书记载的第一次参加唐的对敌作战,针对的是其西面的大漠汗国,两蕃协同唐军成功地完成了从东面威胁敌人并切断敌人东窜道路的任务,从此它们就成为唐在东北可供调遣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击退薛延陀之后,太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本皆中国郡县”[4](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2条)的辽东高丽。在对高丽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中,两蕃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贞观十六年(642年),高丽泉盖苏文弑王专权,高丽政权由亲唐派转入反唐派手中。这一消息最早由营州都督张俭上报唐中央,这令唐王朝不得不心生警惕。但当时太宗认为出兵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拒绝了大臣请伐高丽的要求,同时许婚薛延陀,企图先稳住西边局势,再谋良机。但是,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废太子承乾,幽魏王泰,文弱的晋王治被立为新太子,此时朝中适逢大变,亟需稳定,而泉盖苏文却日益与唐对立,连这年出使高丽归来的太常丞邓素也建议在边境增兵以逼高丽,足见辽东局势正日益恶化。于是,闰六月,太宗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盖苏文杀其王而夺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朕不欲劳费,故未动众也。朕将敕契丹、靺鞨以扰之”[5](卷九百九十一《外臣部·备御四》)。这一计划当时虽然被长孙无忌以少为隐忍为由暂时搁置,但当九月新罗遣使告高丽、百济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时,太宗又旧话重提。在他为新罗所出的四策中,第一策即是“我少发边兵,总契丹、靺鞨直入辽东,尔国自解,可缓尔一年之困,此后知无继兵,还肆侵侮,然四国俱扰,于尔未安,此为一策”。此外,“我又能给尔数千朱袍丹帟,二国兵至,逮而陈之,彼见者以为我兵,必皆奔走,此为二策。百济负海之险……我以数十百船载以甲卒,衔枚汎海,直袭其地(此为三策)。尔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侮,失主延寇,靡岁休宁。我遣一宗枝以为尔国主而自不可独往。当遣兵营护,待尔国安,任尔自守,此为四策”[5](卷九百九十一《外臣部·备御四》)。太宗深知除第一策有商量回旋的余地外,其余三策根本不可能被新罗采用,因为它本身就是由于无力抵抗高丽、百济二国进攻才乞师的,就算假扮唐军能蒙混一时,终非长久之计;三、四策更摆明要对新罗实施管治,它势必更加难以接受。第一策则不同,既然“此后知无继兵,还肆侵侮”,那么如果唐派遣继兵,则问题就有望解决,“所以太宗本身相信是属意于第一个可以让他有进军高句丽借口的方案”[9](37页)。可见,太宗最初的计划是不多发中国之兵,而是以与高丽接壤的辽西契丹、东北靺鞨为主要兵力,对高丽实施骚扰战术以消耗对手实力。这与太宗利用诸族军队为唐军充当先头部队

的一贯方针是一致的,是他以夷制夷思想的具体运用。可以说,到这时,战争已是一触即发。

当贞观十八年(644年)泉盖苏文公然违抗唐的和解命令时,征辽就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在太宗心中早已盘算了好几遍的对两蕃的征用计划也就由口头付诸实践了。七月甲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4](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7条)。由于辽水上涨,到十一月张俭等仍没能渡过辽水。而在十一月太宗已经抵达洛阳,点将募兵,随后大军大集幽州。由于两蕃和幽、营二府兵没能完成“先击辽东以观其势”的任务,所以事情并未按太宗的计划发展。但箭已在弦,不得不发,太宗也顾不得这些了。十二月,下《命将征高丽诏》,对各部人马的任务做了统一部署,其中李勣、江夏郡王道宗率主力部队长驱辽左,正面作战;行军总管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人率本部落人马,随机进讨;而“契丹蕃长于勾折、奚蕃长苏支、燕州刺史李元正等,各率其众,绝其走伏”[8](卷七《命将征高丽诏》),并仍然担负六军前锋的任务。随后,由李勣总领的前军及新罗、奚、契丹军队开始分道出击高丽,本来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动的两蕃军队也就只能是随同前军一起开拔了。高丽的盟友百济此时见风使舵,转而投向唐一边。次年正月,百济太子更与契丹、奚、新罗使者来朝,各贡方物。这样,高丽就夹在了两蕃与百济、新罗之间,唯有北面的靺鞨尚与之联合。

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太宗大军至定州,此时前军李勣兵分三路从辽西柳城出发。一路由他亲率前军主力于四月渡辽水至玄菟,一路由江夏郡王道宗率数千兵到达玄菟北面的新城。李勣、道宗两路都由于高丽坚守不出,所以并未接战。而第三路也就是由营州都督张俭率两蕃等少数民族军队组成的东北兵团,却在先行完成了邀击泉盖苏文,使其不敢前往辽水前线的任务后,又“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4](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九年4条),夺了一个头功,足见两蕃军队战斗力不弱。五月,前军三路抵达辽东城下,太宗大军随后与之会合,激战旬有二日终克之。在这一战中,“行军大总管英国公勣、行军总管张俭等率领骁锐,元戎启行,北狄西戎之首,咸为将帅,奚、靺鞨、契丹之旅,皆充甲卒……总萃辽东之城,攻其南面”[8](卷七《克高丽辽东城诏》),江夏郡王道宗等攻城西面,最后唐军利用火攻,率先攻破辽东城的西南角而克之,相信张俭所率的东北兵团在此役中出力不小。

五月,唐进军安市,虽然唐军以一对五,击退15万高丽援军,但安市仍然未能攻破。八月,太宗徙营于安市城南继续攻城,高丽眼见势危,急遣靺鞨前往薛延陀,试图联合薛延陀东西夹攻唐军。虽然薛延陀慑于唐王朝的威势,回绝了这一要求,但为了预防不虞,太宗仍然下令随同前军开拔的蕃将执失思力率部回撤,屯兵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而张俭所率的东北蕃汉兵团在辽东城一役后不再见单独记载,是不是也像执失思力一样奉命调回营州防备和威慑薛延陀,或者由于以后一直随同李勣主力作战,不再独挡一面而没有单独记载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无论如何,从这些零星的记录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辽西两蕃既是唐外交上的有力筹码,也是太宗战局上一枚重要的棋子,无论是防备、威慑还是进攻高丽,其作用都不可低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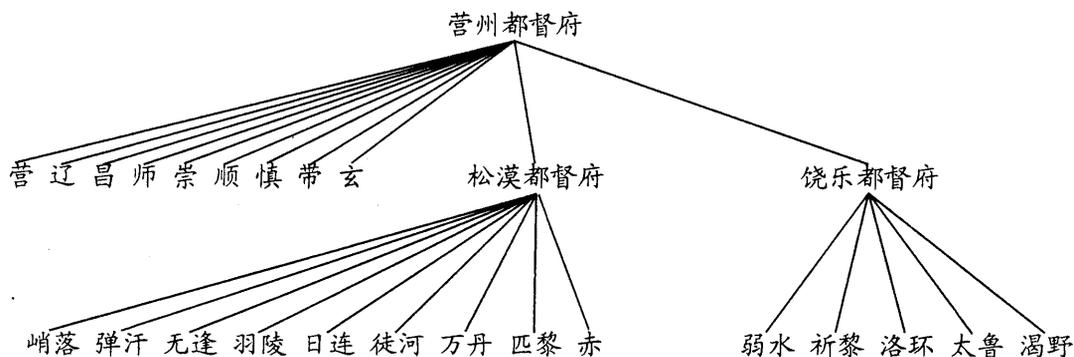
九月,辽东天气转寒,太宗的第一次征辽不得不匆匆结束。十月,大军经过泥泞的辽泽回到营州。在这里,太宗首先祭奠了战亡士卒,紧接着就对从征有功的辽西两蕃大加赏赐,“尽召其(契丹)长窟哥及老人,差赐缿采,以窟哥为左卫卫将军”[6](卷二百十九《北狄传》),奚大酋苏支也因从战有功,赏赐有差,但对契丹从征的大酋于勾折则只字未提。从战斗的激烈程度推知,充当六军前锋的契丹、奚伤亡一定不小,于勾折有可能正是在其间阵亡了,可见奚、契丹在这次征辽中是出了大力的。正因为如此,窟哥和苏支才成为征辽班师后最先获得嘉奖的诸夷酋长,这既表明太宗对两蕃在此次征辽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满意,更含有为以后再度征辽先行收人心于辽西的意图。因为从《班师诏》中可以看出太宗对“但以贼帅莫离支犹不授首,本图未果”[8](卷七)耿耿于怀,势必还会整军重来,而要攻辽东,就必须先牢牢控制住辽西,一旦两蕃与唐为敌,则后果不堪设想,况且两蕃军队还是对高丽作战的有用力量。果然,一年多后即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太宗就又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将兵3000,“其营州都督府所营兵马尽皆隶勣”[5](卷九百八十五《外臣部·征讨四》),自新城道攻入高丽,开始为第二次大规模征辽作准备。

当第一次征辽结束后,太宗的注意力又回到两蕃西面的薛延陀身上。贞观二十年(646年)六月,薛延陀属部回纥、同罗等合攻薛延陀多弥可汗,多弥大败。“帝以延陀破亡,……遣右领军卫大将军执失思力领突

厥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统所部兵,分道并进”[5](卷九百九十一《外臣部·备御四》),以击薛延陀。这是两蕃第二次参加对西面薛延陀作战,太宗把两蕃来回征用,随同营州都督府兵东征西讨,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此役,唐军连战连捷,最后灭薛延陀汗国。

薛延陀灭亡后,北方大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统一强大的汗国出现,各族势力处于重组阶段,而此时唐的强盛对他们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从贞观二十年灭薛延陀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除铁勒、回纥、契丹、奚等13姓各遣使朝贡,表示“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汉官司,养育奴等”外,“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4](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二年9条),诸夷争相“请同编列,并为州郡”[4](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一年15条)。在这股由四夷掀起的内属高潮中,两蕃也不能例外,最终全部归附了唐朝。于是,唐在其属地广设羁縻府州。早在征辽的那一年即贞观十九年(645年),唐为处契丹乙失革部而置带州于营州境内,同样隶属营州都督府管辖。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四月,契丹辱纥主曲据帅众内附,唐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据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同年十一月,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唐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以其别帅达稽部置峭落州,纥便部置弹汗州,独活部置无逢州,芬间部置羽陵州,突便部置日连州,芮奚部置徒河州,遂斤部置万丹州,伏部置匹黎、赤山二州,各以其酋长辱纥主为刺史,俱隶松漠都督府。另以奚部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使持节六州诸军事、右领军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又以其别帅阿会部置弱水州,处和部置祈黎州,奥失部置洛环州,度稽部置太鲁州,元俟析部置渴野州,也各以其酋长辱纥主为刺史,俱隶饶乐都督府。此外,“复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兼统松漠、饶乐地,置东夷校尉”[6](卷二百一十九《北狄传》)。东夷校尉多由营州都督兼任,主要负责协调契丹、奚各部事务。这样在辽西就形成了唐一手扶持两蕃无分轻重的局面。在辽西设立的这些众多羁縻府州中,一部分是归营州都督府直接管辖,一部分归松漠、饶乐二都督府统领,但不论是松漠还是饶乐都督又都按例受辖于营州都督。这样唐通过把奚、契丹正式纳入唐王朝行政建置的方式,从而把辽西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贞观二十二年营州都督府下辖羁縻府州图



辽西局面基本稳定以后不久,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带着对辽东未平的遗憾崩于翠微宫。直到则天朝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叛唐,唐对东北地区的羁縻统治一直较为稳定,东北诸族尤其是两蕃与唐的关系其间虽偶有反复,但大体上是倾向于友善的。正是这种稳定的统治、亲善友好的关系为高宗征辽的最终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给两蕃的生息壮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的成立是契丹复原和壮大的转机”[7](3页)。但力量得到恢复和壮大的两蕃,在则天朝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却逐渐成为唐王朝的腹心之患,这不能不说与唐初统治者的意愿已相距甚远了。

注释:

①七年改称都督府,管营、辽二州。

②先称辽西郡,寄治于营州城内,后称燕州,治所在辽西县,此辽西县当指的是营州境内的辽西故郡城。

③《新唐书·地理七》将威州归于营州都督府管辖,《旧唐书·地理二》在讲到威州时指明是贞观元年隶幽州大都督,但在营州上都督府所督州中又将它划归营州都督,可能威州一度改隶幽州,后觉不妥,随即又归营州。

参考文献:

- [1]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孙玉良. 唐朝在东北民族地区设置的府州[J].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86,(3).
- [4]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0.
- [6]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张正明. 契丹史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8]董浩,等.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3.
- [9]黄约瑟. 薛仁贵[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Two Foreign Tribes and Early Tang's Northeast Strategy

LI Rong

(Basic Courses Department, Logistics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the PLA, Chongqing 400016,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Liaoxi Corridor, the early Tang adopts a northeast strategy of shielding the two foreign tribes of Qidan and Xizu and winning them over, so as to take control of the Liaoxi Area and check Tujue and Gaoli. It takes nearly 30 years for Gaozhu and Taizong to complete the takeover of the are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Liaoxi; Northeast China; Liaodong; two foreign tribes

[责任编辑:凌兴珍]